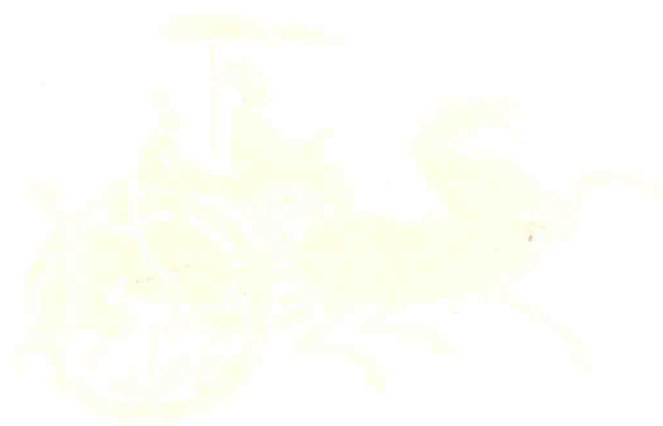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

A STUD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张德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

A STUDY OF SINOLOGIST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UNYU*

张德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 / 张德福著.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203 - 3489 - 1

I. ①汉… II. ①张… III. ①《论语》—英语—
翻译—研究 IV. ①H315.9②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14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5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以下项目资助：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6YYB007）

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立项文号：2015JS00009B）

序

张德福博士的专著《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顺利付梓，我作为他曾经的导师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标志着他在治学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体现出他持续投身学问的信念与壮心。

张博士在复旦大学读博期间，异常刻苦用功，可谓与时竞驰，珍分寸之阴，三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与文科图书馆度过的，这为他日后的研究生涯打下较厚实的基础。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他因积极卷入由我领衔的一个典籍研究项目而将《论语》英译研究作为选题，并在我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写作，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返回原单位，在继续从教的同时，开始了《论语》英译研究的再发轫，经几年的努力，在这个研究方向的开挖与拓展途中，找到新的学术聚集点，并下功夫着实地耕耘了一番，这本专著就是他努力研究的新结晶。此作我以为是具有相当质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填补了《论语》英译研究的一个空白，值得祝贺。

《论语》英译研究，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我国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相关文章、专论或已近汗牛充栋。综观起来，这些文著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评价型的，即是对一个译本从宏观或微观角度进行评判，甚至还会有专门指谬的章节；二是比较型的，即对两个或多个译本进行比较，比较角度可以是文化的，也可以是技术的，等等，呈现的是各译本的优劣之处；三是专题型的，即是在积累相当材料的基础上，围绕某一个较大的研究题目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细致的剖析或探赜，最终一般都以专著的形式呈现。相较于前两种类型，这第三种研究的前期工作更费时、费精力是不言而喻的，因而这个类型的《论语》英译研究做的人并不多，而恰恰是这个类型的研究，其对研究者的要求会更高，

其研究成果所含的揭示性也会更深广些。张德福博士的这部专著就属这个类型。

本书集中对一批海外汉学家的《论语》全译本逐一进行了细致的耙梳,并以时间的推移与时势的演进,独特地将这些译本以四个时期作为分野,每一时期都有标志性译者作为首要述评,然后再娓娓论及相关重要译者的成果,既有评判,又有分析,且这种评判与分析都从每位译人的庭训教养、学术背景、从业生涯、价值取向甚或个人偏好等角度来进行,穿插其中的有许多比较细致的考证、探究乃至质疑等,这些内容不仅体现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者都具有重要的提示或参考意义。

此书能写得成功,主要的原因是作者对所涉及的译本都事先花精力与时间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读,即先在所有译本的精微层面上苦下了笨工夫,这就确保了作者对于原译的把握,讨论就有底气。这一点在作者书中所引用的大量译例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以为,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未尽精微者,一般难以致广大。这一条特别对中国学者而言,更有着承继中国传统学问之道的意义。

做学问首先是要扎扎实实地读书、读原著(也包括读原译)。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不少做翻译研究的人,并不是把读书作为基础与前提条件,而是纯粹以查书,包括运用各种搜索工具觅寻材料的方式来完成学术写作。如此这般当也可做出一份外形可观的所谓学术蛋糕,然而实际却是一款单调无味的面团而已,食用者咬上一角就倒了胃口,更谈不上去快其朵颐了,因为腹笥空空者是断然做不出真正有价值、有品味之学问的,即使形式上可以端出洋洋洒洒的文字,但其学术的含金量是没有的,其学术的可靠性是经不住推敲的。令我欣慰的是,德福此书的写作确实是以扎实读书为基础,以掌握较翔实材料细节为前提,评断分析都尽量做到出之有据,以备核查。

翻译研究是一个常究常新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英译研究仍将会持续不断。这是因为不仅原有译本会引来新读者群的新解读与新分析,而且还会有新的译本在国内外问世。这样,《论语》英译研究的源泉活水也就不会停涌。诚然,每一时期的这种研究会受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语境影响而独具风格。今天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继续

从事这项研究，其主要目标之一，应当是为中国文化与资讯有效走出去服务。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梳理、探研国内外学者的中国典籍翻译，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为我们的对外翻译事业提供策略与原则借鉴。这个意识在德福的书中最后部分已有所论及。

我以为，当下对于中国典籍的外译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或考虑到，由于目的或者面向的读者群不同，这种翻译应当分清楚文学性翻译与学术性翻译、普及型翻译与研究型翻译的不同功能后再行动笔，而就国外广大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当下认知程度而言，普及型翻译（包括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应当是译者首要关注的问题，当然这也应是《论语》英译研究者在选题时的一个重要考量。我希望德福日后的研究能适当聚焦这个问题，并为此去做新的探索。文章合为大势而动笔，研究应向广众而选题，不亦正道乎？是为序。

何刚强

2018年8月

写于沪上寓所补拙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述评	(3)
一 国内《论语》英译研究	(4)
二 国外《论语》英译研究	(7)
三 《论语》英译研究的特点与不足	(13)
第三节 研究的范围、目的与意义	(14)
第四节 研究途径与理论方法	(15)
第二章 起始期:附注存真	(17)
第一节 早期《论语》英译概观	(17)
一 高大卫的《论语》英译	(17)
二 理雅各的《论语》英译	(19)
三 詹宁斯的《论语》英译	(20)
第二节 威妥玛与《论语》英译	(23)
一 个人背景:从外交官到语言学者型译者	(23)
二 历史文化语境	(26)
三 翻译动机与翻译目的	(29)
第三节 威译本的注释翻译	(31)
一 夹注	(31)
二 脚注	(41)
三 注译之外	(48)
四 余论	(51)

2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

第四节 本章小结	(54)
第三章 延伸期:质直求真	(55)
第一节 本期汉学家《论语》英译概观	(55)
一 韦利与《论语》英译	(55)
二 韦译之外	(59)
第二节 赖发洛与《论语》英译	(63)
一 个人背景:从海关洋员到文化敬畏型译者	(63)
二 历史文化语境	(65)
三 翻译动机与翻译目的	(67)
第三节 赖译本的质直翻译	(69)
一 赖译的“真实翻译”	(70)
二 三类译误评析	(73)
三 余论	(8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87)
第四章 发展期:释译达意	(89)
第一节 本期汉学家《论语》英译概观	(89)
一 庞德与《论语》英译	(90)
二 庞译之外	(94)
第二节 魏鲁男与《论语》英译	(98)
一 个人背景:从留学生到文化使者型译者	(98)
二 历史文化语境	(100)
三 翻译动机与翻译目的	(103)
第三节 魏译本的阐释翻译	(104)
一 语义对等	(105)
二 词汇充分	(108)
三 语法正确	(110)
四 文体对应	(112)
五 读者因素	(114)
六 时空因素	(117)

七 文化概念	(119)
八 余论	(12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21)
第五章 繁荣期:多元逐新	(123)
第一节 本期汉学家《论语》英译概观	(123)
一 道森与《论语》英译	(124)
二 利斯与《论语》英译	(126)
三 安乐哲、罗思文与《论语》英译	(131)
四 白牧之、白妙子与《论语》英译	(137)
五 华兹生与《论语》英译	(141)
六 希勒与《论语》英译	(143)
七 其他《论语》英译	(146)
第二节 亨顿与《论语》英译	(157)
一 个人背景:从诗人到作家型译者	(157)
二 历史文化语境	(158)
三 翻译动机与翻译目的	(162)
第三节 亨译本的语义、交际翻译	(163)
一 语义转换	(164)
二 交际效果	(169)
三 语义和交际兼顾	(174)
四 副文本的应用	(177)
五 余论	(179)
第四节 森舸澜与《论语》英译	(179)
一 个人背景:从专家到研究型译者	(180)
二 历史文化语境	(182)
三 翻译动机与翻译目的	(185)
第五节 森译本的丰厚翻译	(187)
一 丰厚翻译与《论语》文本	(187)
二 森译的“丰厚”特点	(189)
三 余论	(206)

第六节 本章小结	(207)
第六章 总结与思考	(210)
第一节 译者的显身	(210)
一 汉学家《论语》英译本的翻译取向	(210)
二 汉学家翻译行为影响因素及其表现	(215)
三 汉学家译者主体性的演变特点	(218)
第二节 汉学家《论语》英译研究的启示	(221)
一 汉学家及其典籍翻译的重要性	(221)
二 汉学家《论语》英译的衍变性	(224)
三 汉学家翻译行为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226)
四 典籍复译及典籍翻译批评的必要性	(227)
第三节 中国典籍的跨文化传播	(231)
一 《论语》跨文化传播研究现状	(231)
二 汉学家《论语》英译影响与传播	(232)
三 中国典籍跨文化传播模式构想	(240)
第四节 中国典籍外译的反思与展望	(242)
参考文献	(248)
本书《论语》英语全译本列表	(273)
本书《论语》英译者人名索引	(277)
后 记	(281)

第一章 绪论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发展与文明进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其中，儒家经典及其思想的对外译介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汉学家所扮演的译者角色尤为表现突出。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汉学家译者群体及其《论语》英译现象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2000：588）而《释名·释典艺》则云：“《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论所语之言也”；又云：“论，伦也，有伦理也”（刘熙，1985：100—101），亦成一家之言，不无新见之意。无论如何，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博大精深，正如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所言：“《论语》者，五经之鎔鑄，六艺之喉衿也”（转引自焦循，1987：14）。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经过世代儒家学者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论语》集中体现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美学等方面的丰富思想，是对儒家时代精神深刻而全面的提炼和升华。数百年以来，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不断交往，该书的译介在历史上对东亚、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肇始于16世纪末,明人范立本所编《明心宝鉴》(*Beng Sim Po Cam*)为中国哲学著作的第一个西传译本^①,其中包括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等诸家的论述和格言。译者高母羡(Juan Cobo, 1546—1592)为西班牙道明会传教士,被认为“是16世纪第一个把中国文献译成欧洲语言的人”(张西平, 2001: 298)。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华生活20余年,曾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译本微加注释并题曰: *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 (汉语大意为“中国四书”)(费赖之, 1938: 55),是第一个迻译儒家经典“四书”的外国人^②。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在巴黎出版了他与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 1624—1684)和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三位传教士的拉丁文合著《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该书不仅包括《论语》《大学》和《中庸》的译文,而且广泛论及儒家的思想和著述,在欧洲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在布拉格出版了第一个“四书”西文全译本,即拉丁文译本《中国六大经典》(*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译本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为基础,篇幅多达608页。

《论语》的英译始于英国人泰勒(Randal Taylor)经拉丁文转译而成的《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③。该译本于1691年在伦敦出版,内容较为零散而无系统,涉及《大学》《中庸》和《论语》,其

① 关于该书的出版年代,有1592年、1593年、1595年三种说法,出版地点为马尼拉(姜林祥, 2004: 205)。另外,谭卓垣(Taam, 1953: 148)认为首部关于中国哲学的翻译作品是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Inácio da Costa)的《大学》(*Ta Hsüeb*)拉丁文译本,取名为《中国的智慧》(*Sapientia Sinica*),于1662年在江西建昌刊行,该观点值得商榷。

② 该译本为拉丁文非全译本,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马祖毅,任荣珍, 2003: 34; 参见何刚强, 2007: 77);有关该译本的证据还见于艾儒略(Giulio Aleni)《大西利先生行迹》:“利子尝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本国。国人谈之,知中国古书,能识真原,不迷于主奴者,皆利子之力也”(转引自姜林祥, 2004: 207)。

③ 有些中国学者将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译为《孔子的伦理》,似有欠妥之处,因为“伦理”(大致与英文“ethics”相对应)和“道德”分别指向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两者在概念属性、文化渊源及语义内涵上皆有不同。

中有关《论语》的内容主要通过征引少量原作语句来解读孔子的道德思想。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从未到过中国，但在华人的帮助下学习中文，1809年在印度塞兰布尔（Serampore）由传教印书馆（The Mission Press）出版了其《论语》汉英对照节译本《孔子的著作》（*The Works of Confucius*），内容仅包括原作的第一篇至第九篇，该译本是迄今发现最早译自汉语原作的《论语》英译本。直到1828年，《论语》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作为英国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英译“四书”的一部分在马六甲出版。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所有中国哲学家当中，孔子在西方被研究得最多（Taam, 1953: 147），而《论语》是除《道德经》之外翻译成西方语言最多的中国典籍（Durrant, 1981: 109）。对于儒家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有如此评价：“儒家学说绵延不绝，经久不衰，在人类历史上难以找到任何政治文化可与之比肩者”^①（Spence, 1979: 159）。

据统计，国外《论语》英语全译本迄今已超过30个，其中汉学家译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调查发现，伴随着新译本的诞生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国内外有关《论语》英译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涉及译本、译者、译介史等诸多方面，研究内容丰富而多彩。然而，把汉学家作为一个《论语》译者群体并对其译本进行较为全面的历时研究至今付之阙如，阻碍人们充分认识汉学家译者及其译作的阶段特征和演变脉络，难以正确理解两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不利于促进中国典籍的外译与传播，影响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提升，因此很有必要就此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第二节 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述评

作为儒家经典，国外《论语》英译现象由来已久，肇始于1691年转译自拉丁文本的《孔子的道德》，至今已三个世纪有余，经历了从

^① 英语原文为：One would be hard pressed, surveying any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s in human history, to find a parallel for the continuity, longevity, and vitality of Confucianism; 该中文为笔者所译，以下汉语译文若无特别标注，皆为笔者所译。

《论语》非全译本到全译本的发展过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译本的数量增加迅猛,译本风格也多姿多彩。伴随着《论语》各种译本的诞生,国内外学者对《论语》英译的研究几乎同时出现,从最初书评到后来的学术性研究著述。鉴于《论语》翻译研究涉猎广博,不仅有翻译界学者作为主力军,而且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形成中外相关研究各具特色的景象。

一 国内《论语》英译研究

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的研究至少始于20世纪80年代^①,最初表现为对《论语》名言翻译的评析(谭文介,1988)。其实,早在1935年吴经熊于《天下》(*Tien Hsia*)月刊连载长文《孔子真面目》(*The Real Confucius*),不仅论及孔子的寻父之谜、双重性格、幽默与坏脾气以及内心冲突,而且结合例证分析指出:《论语》原文诸多章节言有尽而意无穷,一经翻译其节奏和意蕴便损失大半(Wu, 1935: 184);该文可视为国内学者最早初探《论语》英译的学术论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视角的深入和拓展,研究成果也日趋丰富。综合分析现有文献资料,国内《论语》英译研究按照侧重研究的主题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译本研究、译者研究、译介史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译本研究包括译本整体研究和译本局部研究,在所有四类《论语》英译研究中最常见。译本整体研究一方面涉及单个译本研究,如就威利《论语》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探讨典籍英译的“两个合理性”(何刚强,2005);研究庞德《论语》翻译风格和特色,展现了译者对汉字的痴迷和对孔子的信仰(邸爱英,2009);从译者生平简介、翻译目的等方面对威妥玛《论语》译本的介评(李钢,2011)。另一方面又包括两个及以上译本的研究,如有关理雅各和刘殿爵两个《论语》译本的比较研究认为,理译采用书面语,多复句且措辞古雅,刘译多为口语体,喜单句且通俗易懂(刘重德,1998: 332);指出韦利译本文字

^① 关于《论语》的英译研究,有学者认为“国内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王琰,2010a: 70),该观点似乎欠妥。

比较简练,接近原文写作风格,行文表达难易程度介于理雅各和刘殿爵两个译本之间(刘重德,2001:15—17);多视角研究理雅各、庞德和斯林哲兰德跨世纪《论语》三个译本,兼议典籍复译的必要性(魏望东,2005);对理雅各和威利两个《论语》英译本“文质”风格的评鉴(何刚强,2007)。译本局部研究是就一个或多个译本的某一方面或特定内容所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如关于《论语》英译本核心概念或关键词的研究(王辉,2001;韩星、韩秋宇,2016);以关键范畴为例比较分析理雅各与韦利《论语》译文体现的义理系统(程钢,2002);运用语境和纯理功能思想探讨威利、潘富恩和温少霞、赖波和夏玉和的三个《论语》英译本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特色(陈旻,2009);从中西哲学对话的维度研究安乐哲《论语》翻译的哲学思想(陈国兴,2010);基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意义关系探索马士曼《论语》英译本的特点与效果(尚延延,2016)。

译者研究侧重于《论语》英译本译者的研究,也涵盖译者自身感言及他人对译者的评介,皆一定程度上涉及对相关译本的评判。如介评理雅各及其儒经翻译,肯定译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理氏开启英语世界认识中国文化精华的通路(刘凌维,1996);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对创作的影响等层面对儒经译者庞德的多维度研究(蒋洪新,2001);以《中国经典》为主要参照,从理雅各的生平入手,研究译者的翻译目的、读者对象、译文特色和历史地位(王辉,2003)。译者的切身体会和感悟可以视为译者研究的一种特殊现象,如李天辰(1999)从理解要透彻、要译出内涵、用词要准确、译法要多样等方面就自己主译的《论语》英译本所作的感言,对进一步研究译者及其译本颇具参考价值。

译介史研究注重有关《论语》译介及其研究成果的相关研究,是国内学者研究《论语》英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研究史料丰富,对初涉《论语》英译研究者极具参考意义。如关于《论语》在海外传播史的研究,论及《论语》早期西文版本《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传教士理雅各英译本(1861),利斯英译本(1997)、美籍华人黄治中(笔者注:应为黄继忠)英译本(1997),以及多个其他西方语种《论语》译本(顾犇,1999:101—106);综合考量《论语》自16世纪末

开始西译以来所出现的 30 多个英译本,探讨其英译的缘起与发展历程(王东波,2008b);依据译者身份分类对《论语》英译研究的总结与评价(杨平,2009);依次就 1809 年首个《论语》英译本及其后所产生的 28 个全译本,结合相关研究史料对这些译本及其译者加以简要介评(王勇,2011a)。

综合性研究是在前三类研究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近年来成果丰硕,主要包括同时兼顾以上两个及更多类别内容的研究,也涉及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相关研究、对《论语》英译研究的研究等。如阎振瀛的专著《理雅各氏英译论语之研究》(1971)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了理雅各《论语》译本,从译者个人生平谈起,考证理氏英译《论语》的版本、参考用书、注疏、音译及专有术语,进而从译文处理之方式和译文迻译之手笔品鉴理译本译文,对译文不足之处提出商榷,并就理氏英译《论语》理论与实际加以检讨。而跨学科性《论语》英译研究视野开阔,有关学术成果在国内较为鲜见,却很值得关注和肯定。如借助于《论语》英译的两种诠释定向,研究西方汉学和《论语》英译的互动关系,强调《论语》英译活动对西方汉学当代发展的积极影响(王琰,2010b)。

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研究当为有关《论语》英译研究的博士论文,其中部分已出版相关专著,囿于篇幅,中国知网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近二百篇涉及《论语》英译研究的优秀硕士论文此处不再赘述。譬如,岳峰(2003)运用跨学科研究法多角度分析、阐述理雅各的汉学造诣、在华活动及其相关原因,认为他对中国典籍的严谨译介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陈克培(2006)以理雅各个人经历、宗教思想、知识结构等为切入点,结合“译名之争”“上帝观”等案例探讨其汉学研究特征,认为理氏长期从事儒学研究,坚持对中国典籍采用文献性的忠实翻译原则,译者的思想观念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王东波(2008a)通过比较研究理雅各译本与辜鸿铭译本认为,前者旁引博涉,语义翻译,译注结合以凸显学术性,而后者以意译为主,各自成章,尊重读者以引发共鸣,并指出两个译本各自的不足之处;李冰梅(2009)旨在论证韦利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时代诗学对韦氏个人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影响、在《论语》翻译中折射出他对中国